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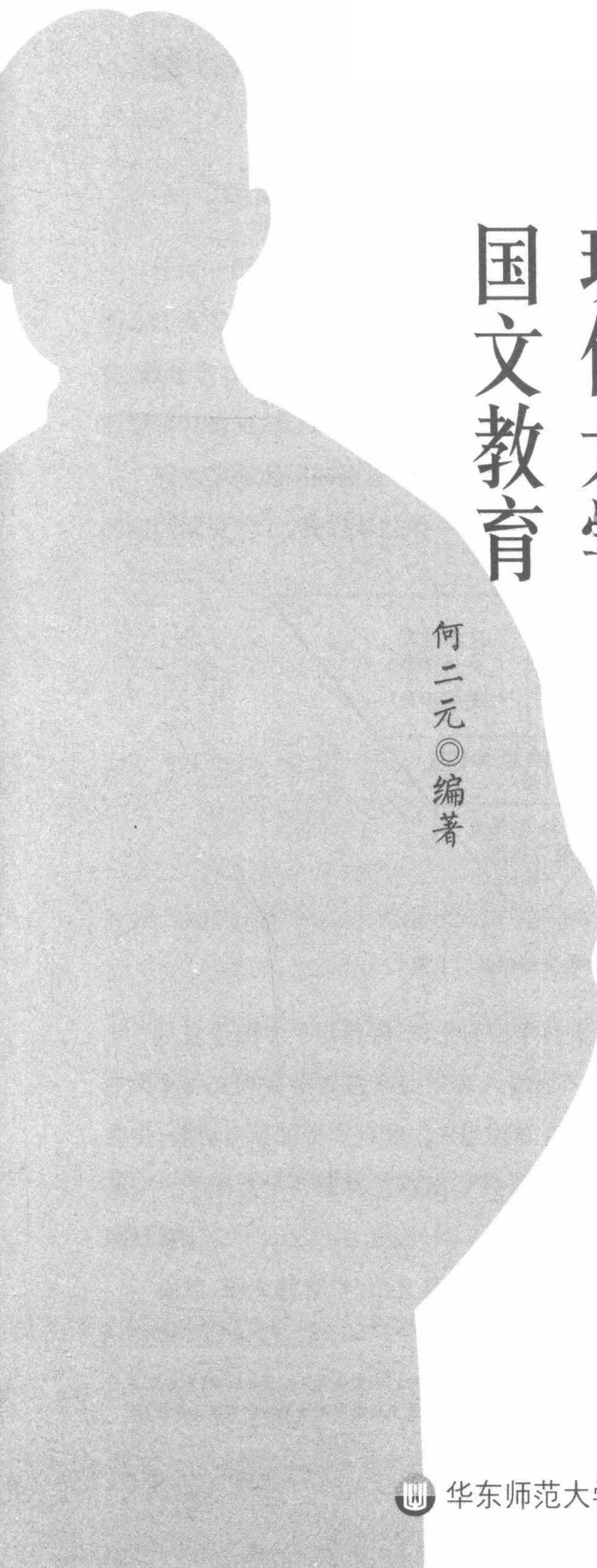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大学 国文教育



何二元◎编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现代大学 国文教育

何二元◎编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大学国文教育/何二元编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-7-5675-6631-6

I. ①现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大学语文课—教育史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H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0650 号

现代大学国文教育

编 著 何二元
项目编辑 范耀华
特约审读 薛 莹
责任校对 张多多
装帧设计 俞 越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插 页 2
印 张 27.5
字 数 396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631-6/G·10469
定 价 5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绪 论

一、缘起：为什么编这本书？

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建设，都始于资料搜集，假如是有点历史的学科，那么还有史料的搜集。在此资料和史料的基础上，得以撰写该学科的教育史、教育学、课程论等专著，奠定学科理论的基本框架。然后在此框架中，或撰写研究论文，或编写教学用书，不断充实、丰富学科理论体系。

假如学科理论的建设确是遵循这样的规律，那么大学语文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就清楚了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图形来显示它的现状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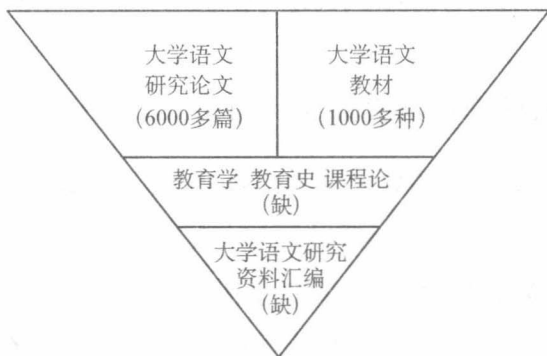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大学语文学科现状

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，对于任何学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资料搜集工作，在大学语文研究领域基本还没有人做过^①，建立在资料基础上的教育学、教育史、课程论等的研究自然也只能阙如，但是教材与论文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。大学语文学科现状呈现出一种缺乏学科理论基础、摇摇欲坠的倒金字塔结构。

固然，语文教育学、语文教育史、语文课程论的专著很多，上中国国家图

^① 如果说有，那么可能就只有李君的《大学语文教材研究(1978—2008)》(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)，其中有对近30年大学语文教材版本资料的搜集。

书馆网站随便一搜,便有一百多种,但是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中小学语文,是不包括大学语文的内容的。语文资料汇集的专书也很多,如《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论集》、《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》、《中国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汇编》、《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》等,但也都是中小学的,不包括大学语文的。本来,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,小学语文、中学语文、大学语文就是三位一体、不可或缺的,曾几何时,“语文”一词变成了偏义词,偏指中小学语文,而大学语文的历史则被遮蔽了,甚至被说成是后起的补课性质的课,是可有可无、随时可以取消的课。我们不必抱怨外界的学科歧视,而是要承认大学语文历史研究的缺位,正视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,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缘起。

一本书,自然不足以拯救一个学科,但是它能为我们学科的金字塔投下一块基石,以此引起同行们的注意,一起来修补我们的学科基础。

二、从大学预科国文到大一国文

大学语文教育方面的资料研究,包括四大部分:一、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资料研究(1904—1922);二、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(1922—1949);三、港台地区大一国文资料研究(1949至今);四、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外高校大学语文资料研究(1979至今)。本书先研究第一、二两个阶段,为了叙述方便,合称为“民国大一国文”。

中国现代教育始于1904年的“癸卯学制”,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发布并实施的学制^①。“癸卯学制”高等教育为三级制,即高等学堂(大学预科)、大学堂(大学本科)和通儒院(研究生院),修业年限分别为预科3年,本科3至4年,通儒院5年。设置大学预科,这一方面固然是照搬日本学制,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新学制伊始,高等教育缺少合格的生源。中华民国成立后,

^① 关于“现代”、“近代”的表述,不同研究领域略有不同,本书采用李杏保、顾黄初《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》(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)第4页的说法:“中国现代史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序幕;中国现代文学史以1919年‘五四’新文化运动为发端;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当以1903年语文教育独立设科而掀开扉页。”1903年即是“癸卯年”,但是发布“癸卯学制”时已是癸卯年年末,亦即公元1904年年初,所以本书采用“1904年”的说法。

教育部推行“壬子癸丑学制”(1912—1913),仍保留大学预科的设置,但明令规定“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,不得独立”,即取消高等学堂,预科附设于本科大学,这更明确了大学预科为高等教育的属性。时人曾作“癸卯学制”和“壬子学制”系统图,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大学预科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,且以“壬子学制”图为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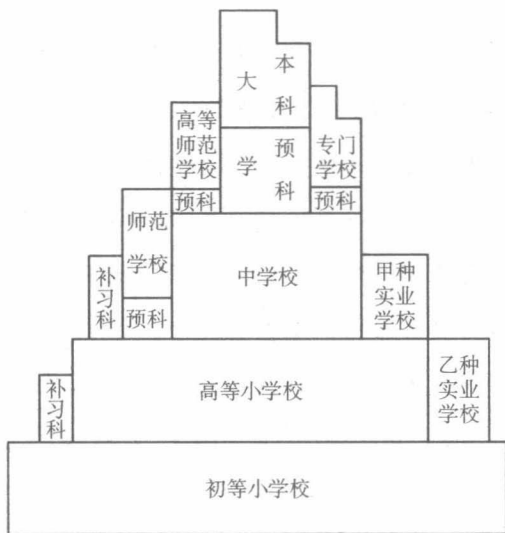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壬子学制图示(局部)^①

“癸卯学制”和“壬子学制”大学预科均有大学语文课,不过在“癸卯学制”中这门课叫“中国文学”(除了初等小学叫“中国文字”外,高等小学、中学和大学预科均叫“中国文学”),这个“文学”和今天的“文学”意思不同,是“文章之学”的意思。把“语文”叫做“文章”,这在中国传统中是常见的,现代学制语文科命名之初,亦为首选。譬如“癸卯学制”制定者之一的张之洞在给张百熙的电文里就说:“中国文章不可不讲。自高等小学至大学,皆宜专设一门。”^②就是说的语文课的设置。有时也并用近似的词语,如“词章”、“文

^① 璩鑫主、唐良炎编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学制演变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,第1061页。原图尚有学生年龄与就读年数等详细信息,本书略。

^② 此则引文在《学务纲要》一篇中出现,凡是本书各篇将正式出现的引文,绪论里均不另作注释,以免重复。后同,不再注明。

辞”。“癸卯学制”之前有个颁布而未实行的“壬寅学制”，就把这门课叫做“词章”。“癸卯学制”的重要文件《学部纲要》中有一条“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”，则是“中国文辞”和“中国文学”并用。不过“中国文学”这个名称终究比较容易引起误解，加上文科大学也有专业性质的“中国文学”课，容易混淆，所以到了民国“壬子学制”，就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预科的“中国文学”全都改为“国文”，至此，大学预科国文的课程性质就更加清楚了。

1922年实行新学制(壬戌学制)，取消大学预科，延长中学教育年限，希望由中学教育能有大学教育的预备的作用，但是事实上做不到，所以1923年12月当时的教育部又令各大学仍暂依旧制设置预科^①。直至1930年教育部才重申废止大学预科令，大学预科的废止在名义上也才得到彻底执行。然而由于生源质量问题，1938年、1945年教育部又两次下令特设大学“先修班”^②，其实还是预备科的意思，所以大学预科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(至1949年)，有研究者认为预科为非常态，所以预科国文不能算正式的“大一国文”，这是过于拘泥“大一国文”之名，而忽略了“大一国文”之实。

民国“大一国文”的正式命名，是在1929年，教育部再次颁布《大学规程》，明确规定“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、国文、体育、军事训练及第一、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外，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基本科目”。1938年教育部“整理大学科目”文件中特别规定：“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，在第一学年终了，应举行严格考试。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。……至达上述目标，始得毕业。”这两个文件都把大学国文列为大学一年级公共必修课，至此大学预科国文便正式成为“大一国文”。有研究者忽略了上述史实，而仅根据民国时期曾有过中学生国文程度低，大学要补课的讨论及我国高校1979年重开大学语文课时有补中学课的意思，就说这是一门后起的补课性质的临时课，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① 吴惠龄编《北京高等教育史料》(第1集)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360页。

② 《国立大学暨独立学院附设先修班办法》，《教育通讯》，1946年第1卷第7期，第24页。

三、民国“大一国文”论文概述

本书搜集“大一国文”资料时段为1904年至1949年,而且绝不排斥大学预科国文研究资料。资料形式以民国学者的论文为主,兼收少数其他形式相关史料。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论文有100多篇,从中精选30篇,下面概述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。

1. 民国大师论“大一国文”

这些年,“民国大师教大一国文”早已传为佳话,但是几乎还没有人提到过“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”,这或许是比大师“教”大一国文更重要的史实。为了证明这样的历史事实,我们先来检阅一下与民国大一国文相关的论文作者的身份——

经学大师**唐文治**,作《国文大义》(并附函)(1913);

国学大师**钱玄同**,作《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教授法草案》(1916);

语言学大师**刘半农**,作《应用文之教授》(1918);

国学大师**闻一多**,作《中文课堂秩序底一斑》(1921);

文学大师**梁实秋**,作《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》(1922)及《再论清华的国文问题》(1923);

国学大师**陈柱尊**,作《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议》(1930)及《大学的国文教育问题》(1933);

著名教育家**孙俔工**,作《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》(1931);

现代散文大师**周作人**,作《杨柳》(1935);

史学大师**吕思勉**,作《论基本国文》(1938);

文学批评史专家**郭绍虞**,作《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》(1939);

语文教育大师**叶圣陶**,作《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》(1940)及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》(1949);

中国古典文学专家**余冠英**,作《比较的读文法示例》(1940)、《谈大学一

年级国文》(1946)、《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》(1948)及《从大一国文教材想到中学国文教材》(1948)；

国学大师**钱基博**，作《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》(1941)；

语文教育家**阮真**，作《先修班国文教约》(1941)及《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》(1942)；

语言学大师**黎锦熙**，作《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》(1942)；

美学大师**朱光潜**，作《就部颁“大学国文选目”论大学国文教材》(1942)；

现代文学大师**朱自清**，作《论大一国文选目》(1942)及《中国文的三种型——评郭绍虞编著的〈语文通论〉与〈学文示例〉》(1947)；

国学大师**高亨**，作《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》(1942)；

国学大师**姜亮夫**，作《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》(1942)；

语言学大师**魏建功**，作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》(1942)及《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》(1947)；

语言学大师**罗常培**，作《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》(1943)；

新文学作家、教育家**杨振声**，作《新文学在大学里——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》(1944)；

著名作家**丁易**，作《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》(1946)；

宋史专家**刘子健**，作《建国人才“最后一课”的国文》(1946)；

周易专家**李镜池**，作《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》(1947)；

国学大师**季羨林**，作《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》(1948)；

文学理论家**徐中玉**，作《国文教学五论·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》(1948)

.....

这就是“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”的超强队伍。

今天研究者常常反思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——今天为什么没有大师？^①

① 2005年，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，钱老感慨说：“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，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，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。”钱老又发问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？”

其实还有比这更为严峻的问题,即: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大师?大师的有无,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,大师的生命是和他们的著述、他们的精神、他们的杰出成就融为一体的,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的著述和精神,大师就永存于我们的时代。大学语文也是如此,重要的不是今天有没有大学语文的“大师”,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继承“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”的研究成果,从这一意义上说,本书题为“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”也是可以的,这也正是笔者不辞艰辛编撰此书的最根本动因。

最后要说明的是,“大师”只是一种尊称,而非正规的学术称谓,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(譬如某某究竟够不够大师?由谁来评定大师?),本书提到他们时,将更多地采用“民国学者”这样的称谓。

2. 关于大学语文的起点

本书选入(或引用)的最早几篇史料,主要为了追溯大学语文学科的历史源头。

第一篇是张之洞《致京张冶秋尚书》,其中说“中国文章不可不讲”(1902)。张之洞是“癸卯学制”拟订者之一,学制酝酿阶段,他就提出“中国文章不可不讲,自高等小学至大学,皆宜专设一门”,从而确定了小学语文、中学语文、大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学科思想。

第二篇是“癸卯学制”重要文件《学务纲要》(1904)中的一段,其中提出“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”,提到“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,止贵明通;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,渐求敷畅,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,不可过求奇古,尤不可徒尚浮华”。

第三篇是林传甲《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中国文学史》的序言和说明,该讲义是最早的大学语文教材,但因书名用了“中国文学史”字样,引起人们对教材属性的争议。笔者仔细研究后确定其为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,时间是1905年。

第四篇是当时的交通部关于高等国文讲义的公函,内含唐文治关于《国

现代大学国文教育

文大义》的论述,主要意思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绝不可忽视大学国文。也有人认为该讲义是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,时间是1913年,已经进入民国。

第五篇是刘半农的《应用文之教授》(1918),一般都视其为关于应用写作的论文,笔者仔细研读后,确定其为民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实验报告。

上述五则资料在大学语文史上都占有“第一”的位置。

3. 大学语文是最重要的公共必修课

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重要课程,这一点不但有“壬寅学制”、“癸卯学制”、“壬子学制”以及其后的民国教育部《大学规程》、“整理大学科目”、《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》等制度层面的明确规定,也有学校一级大量教学文件可以证明,如《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教授法草案》(钱玄同、马裕藻,1916)、《拟请教育部招集国文教授会议确定国文教法建议案》(张渲,1919)、《大学普通科国文教学之計畫》(孟宪承,1925)、《本校预科国文教学大纲》(陈本,1929)、《对于教授国文之新计划》(陈柱尊,1930)、《先修班国文教约》(阮真,1941)、《西南联大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》(黎锦熙,1947)、《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》(魏建功,1947)等。

这一内容在民国学者们的论文中也不断被强调。

唐文治任南洋公学校长期间,高度重视大学国文,在全校各年级开设国文课,还亲自编写国文教材。他对于当时只重视实学不重视国文的现象深恶痛绝,说:“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,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,深可痛也。”(《国文大义》附函,1913)。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杨振声主任主持编写校本国文教材,并作序说:“我们认为每一个国民,尤其是大学生,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,这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,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权利。反过来说,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恰切的表现于文字,那是对于他自身的侮辱,也是对于国家的不敬。”(《新文学在大学里》,1944)胡山源说:“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,为各系所必修,就因为恐怕

其他各系的学生，一旦毕业，学有专长，却连自己民族的‘古今书籍’都不能阅读，也不能‘作通顺文字’，非但使他们自己在发表或运用其所学时不方便，更使他们不能作一个充分的民族成员。”（《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》，1946）

正因为有这样高度的认识，民国时期不仅普遍开设“大一国文”课，很多学校还有大二、大三甚至大四国文课，因此这门课在更多的时候常常不是称“大一国文”，而是更恰如其分地称作“大学国文”、“基本国文”、“普通国文”或“高等国文”。陈柱尊《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议》（1930）一文提议学校要开设“基本国文”课，并且“自大学一年级起至三年级止”都要开设，他回顾亲身经历说：

今上海之大学，如交通大学，在十五年以前（指1915年以前），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国文，此柱所亲历者。闻今之四年级，则尚有国文也。此工科之大学，尚犹如此，况其不为工科者乎。……光华大学，则自一年级至三年级，均有基本国文。柱去年曾代课三月，所代者为三年级，观其各生作文，程度均颇整齐可观。

魏建功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》（1942）说：“我记得民国九年（1920）以后的北京大学预科的国文分为四部分：（1）模范文；（2）作文；（3）文法；（4）学术文。讲授时间合起来一星期有八小时以上。”

黎锦熙《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》（1942）指出：“大学新制（指1938年制度），一年级不分系，一律受普通科学和基本工具的训练，……还要读一年的普通国文”，讲授的时间，“大一国文的学分照部章是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医各六学分，工、农各四学分，师院则八学分”。

民国学者们还特别强调理工科大学必须开设大学国文课。刘其宣《论理化博物两部预科皆有国文科》（1919），认为不但哲学、政治、法律、经济这类语言类学科应该开设国文课，数理化和博物这类“专求实用之学”的专业，中国本来没有，要想用语言文字准确理解表达，难度必然更大，所以尤应学好国文课。《南洋周刊》上那篇署名“云”的文章（1926），题目就是“工程和本国文”，批评有的人认为“我们研究工程的人，只要能够于工业上发明几种东

现代大学国文教育

西就好了，文字的好坏，有什么关系呢”，他认为要振兴实业，离不开文字宣传，所以学工科的学生尤其要学好国文。上海交大国学系主任陈柱尊作《对于教授国文之新计划》(1930)说：“希诸同学皆明瞭现在研究国学之切实目的，及对于本人所学之应用及需要。盖本校同学，是研究铁道管理或工程者，将来毕业后，毋非服务于铁路工厂，及其他关系交通及工业之机关，最大需要中，未免有文字表现之一格。”

大学语文的重要性，在这些论文里得到充分的论证。

4. 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

民国学者对“大一国文”的课程性质也有深入的讨论。

罗隆基《清华国文教授改良之商榷》(1919)，对国文课的性质进行了探讨，认为：国文宜求实用，唯其实用，则清华之国文，非专科的，乃普通的；非美术的，乃简明的。因此清华学生应该掌握的是：(甲)翻译文字；(乙)记述文字；(丙)说理文字；(丁)交际文字。南洋公学王信吾《我校的国文问题》(1925)提出大学国文应该是：(一)适用的。国文课应当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语言文字工具，譬如教他们怎样去发表工程与经济的学识。(二)科学的。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效率。(三)适应时代的。学习古文的目的，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，为此需要探求历史的本源。邱椿《大一国文的价值之检讨》(1948)认为“大一国文”的价值依次为：社会的道德的价值、审美的娱乐的价值、实用的职业的价值、形式陶冶的价值。

民国大师们不赞同把国文等同于文学或国学，提出很多有见地的看法。刘半农《应用文之教授》(1918)大声疾呼：“现在学校中的生徒，将来是否个个要做文学家？”“现在社会上，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学校毕业生：学实业的，往往不能译书；学法政的，往往不能草公事，批案件；学商业的，往往不能订合同，写书信；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，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。”

周作人《杨柳》(1935)说：“不知道从那一朝代起国文这名称变成与国学同义，而这国学范围又变大了，除义理考据词章之外还加上了经济，不过这

并非亚丹斯密的而是文中子的,即经世济民之道。因此国文的题目可以有許多花样,如养浩然之气论,杨朱为红印第安人考,社会主义出于儒家说,抗日救国策,拟重修盘古庙上梁文,等等。这样要表示国学内容的丰富本来也很好,但是离开考查学生使用国文的实力这目的却是很远了。”

朱光潜《就部颁“大学国文选目”论大学国文教材》(1942)说:“依我的愚见,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,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,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。”“我们不能希望一般大学生能作高深古雅的诗词歌赋和古文,能固然好,不能也无妨;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用浅近文言或国语写公私信,做学术论文,叙述时事或故事,描写眼见耳闻的人物,写得辞明理达,文从字顺。我们所悬的大学国文教学的目标不应低于此,也不必高于此。”

姜亮夫《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》(1942)说“我们大学一年级的国文,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,能写清顺的文章,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”,至于“思想训练,也已有‘论理学’‘哲学’等科目负责”。

丁易《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》(1946)说:“大一国文讲授的对象是各院系的学生,他们有的学工,有的学理,有的学农,有的学医,他们并不需要做一个文艺作者,更不需要做一个古文家,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写一篇通顺而无不合文法的文字,简单的说,就是希望‘词能达意’,以备应用(学文科的这更是基础)。”

徐中玉《国文教学五论·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》(1948)说:“我总感觉,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‘固有文化’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,教者也不可能传授。一定要传授,一定要接受,其结果便是双方都感到困难、无趣,白费精力与时间。”

5. 关于“大一国文”教材的讨论

编教材要有教材理念,民国学者编写的“大一国文”教材数量远不如今,然而关于教材理念上的讨论则远胜于今,也许正因为对教材理念有深刻了

现代大学国文教育

解,乃不敢粗制滥造,留下的皆是精本。笔者收集到的民国“大一国文”教材不过 30 余种,而收集到的 100 多篇论文几乎都有教材研究的内容,这里仅选标题上显示教材研究的篇目简单介绍。

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编写《国文大义》(1913)并函达民国教育部,教育部复函对教材进行充分的肯定,说“查核该讲义博稽远引,熔铸群言,于斯文之能事,发帙殆尽。《国文大义》论文之才气等篇,均极精当,……选录前贤论文之作,可谓择精语详。《阴阳刚柔大义》引曾文正之绪而大畅之,亦多独到之处。近日国学衰微,学者惮于深造,得此书为指南,洵于文学大有裨益”。

教育部之重视大学国文教材,不止此一例,其后有陈立夫(时任教育部长)为部定《大学国文选》(1943)作序云:“大学一年级之国文学程为共同必修科目,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,与运用文字之技术,以期渐近而阐扬固有之精粹者也。是则踵前修之轨迹,示楷式于方来,取精用宏,宜存矩矱,先河后海,方知津逮,教材无妨其从同,进度乃臻于一致。”

民国时期围绕“大一国文”教材最大规模的一次讨论,也与教育部统编教材有关。1942 年教育部颁发“大一国文选目”,作为统编教材选篇的公示,由此引发了围绕“大一国文”教材的争论。1942 年《高等教育季刊》推出了一期“大学国文教学特辑”,选登了《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》(黎锦熙)、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》(魏建功)、《就部颁“大学国文选目”论大学国文教材》(朱光潜)、《论大一国文选目》(朱自清)等十多篇文章。由于部颁“选目”全部是文言文,又采用“经史子集”的编排框架,所以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文白之争,其中也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有价值的意见,如黎锦熙提出要根据不同院系专业编写不同内容的补充教材,甚至提议可用《大公报》替代“大一国文”教材;魏建功提出要重新反思取消大学预科与国文水平低落的关系;朱光潜和阮真都提出“大一国文”教材要兼顾阅读与写作两个方面;陈东原提出大学国文要教学生学会读整本的专书等。至于教材编写与课程性质的关系,即不能把国文教材编成文学教材、国学教材、文化教材等,也有较多的讨论。

除 1942 年围绕部定教材的讨论,民国时期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文章,下面仅列举标题上标明研究“大一国文”教材的篇目:

孙俚工《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》(1931)、郭绍虞《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》(1939)、谢文炳《谈大学的国文教材》(1939)、高亨《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》(1942)、朱自清《中国文的三种型——评郭绍虞编著的〈语文通论〉与〈学文示例〉》(1947)、叶兢耕《大一国文教材应以语体文为主吗?》(1946)、胡毓寰《大学国文教材私议》(1946)、赵仲邑《关于大一国文选本》(1947)、余冠英《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》(1948)和《从大一国文教材想到中学国文教材》(1948)、叶圣陶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——〈大学国文(现代文之部)〉序》(1949)等。

除了专篇论文外,在各种“大一国文”教材的序言、前言中其实也包含民国学者的不少意见,如钱基博编师范讲习科《国文》教材(1929),其“编辑大意”说:“本书所列各文,不论语体文言,务以辞意明爽,能涵养文学兴趣者为主。凡古拙之文言,欧化之语体,涩舌聱牙,不易成诵者,概不列入”,“作诗曰吟,读时曰诵,音节最重。本书所选白话诗,如胡适、唐寅、归庄之作,皆音节爽亮,至古诗则选其清写白描,自然有致者”。

1948年余冠英发表《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》一篇,可以视为对民国“大一国文”教材讨论的一个总结,其中特别介绍了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材。清华在文选型的教材外,特别重视指导学生读整本的书,每年选用六本至八本专书让学生在课外阅读,在堂上讨论,和国文选同列在考试范围。已经用过和即拟选用的书有:《鲁迅自选集》和《鲁迅杂文集》、《胡适文集》、老舍《骆驼祥子》、茅盾《子夜》和《清明前后》、曹禺《北京人》、夏衍《法西斯细菌》、沙汀《淘金记》、屠格涅夫《罗亭》(陆蠡译本)、高尔基《母》(孙光瑞译本)、罗素《幸福之路》(傅雷译本)及冯雪峰《乡风与市风》。

这些做法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有很大的启发。

6. 关于“大一国文”教学方法讨论

“大一国文”教学方法也是民国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。吕思勉《论基本国文》(1938)说:“学校的国文成绩,为什么会劣于私塾呢?最易得的答

案,是练习时间的少”,“现在的学习国文,讲授所占的时间太多,自习所占的时间太少。”他说:“较高深的问题,如源流、体制等,可察看学者的程度,能懂者告之,不能者不必。偶有过高之论,为学者所不能懂,亦无妨。因为目前虽不懂,将来总是可以懂得的。在此等情形之下,最要者为不懂则置之,徐俟其自悟,切戒穿凿求通,一穿凿,就入于歧途了。尤其紧要的是高深之理,虽可出以通俗之辞,使人易悟,然仍以不失真相为主。过求通俗以致失其真相,是最要不得的。”

对此,很多学者都有同感,黎锦熙《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》(1942)说:“如我所知见的一部分大一国文教员之所为,例如首篇‘易乾坤文言’,有讲到半个学期还未完毕的,他是传授易学,而且是他自己正在趁此讲授机会而进修的易学,这种进修工作,自己还未免乌烟瘴气,怎能不教得一塌糊涂?”姜亮夫《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》(1942)说:“甚至有的先生们,把一套考据的方法用在这般学生身上!半年讲半篇汉书艺文志,或一年讲一篇文献通考序,他们把教国文与‘讲学’闹在一块,这是对现在的大一新生是没有益的。”丁易《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》(1946)也说:“因为教材的限制,教学方法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革新,讲的时候不外是解释题目,介绍作者,训诂字句,分析篇章一些老套。有的甚至详征繁引的考证起来,以■自己的博学^①,于是一篇《离骚》可以讲上一学期,一篇《乾文言》可以敷衍两个月,听的人惊其渊博,讲的人也就觉得和中学是大不相同了”,“这样的讲授,结果除了灌输学生一点死知识而外,是任何效果也收不到的。这只要看大一国文实施几年毫无成绩,便是最好的证明。所以这门科目如果不再改弦更张,那么只是白白的浪费学生光阴,倒不如干脆不设立的好。”

那么“大一国文”究竟应该怎样教学才不是“浪费学生光阴”呢?很多民国学者都指出应该把它当作一门工具课。正如朱光潜《就部颁“大学国文选目”论大学国文教材》(1942)指出:“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,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,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。”姜亮夫《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

① “■”为原文字迹模糊不能辨认。